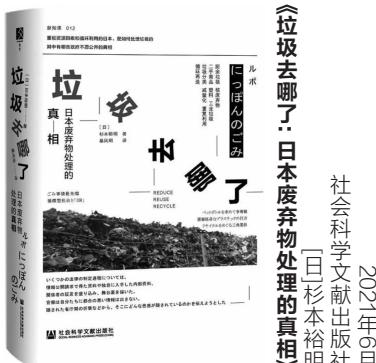


垃圾分类“优等生”背后的哀愁



文明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今天,当我们尽情享受着科技文明带来的种种益处时,不可避免会制造大量垃圾。出于对稳定性耐久性的极致追求,今天市场上的许多商品已很难实现自然降解,于是越来越多的垃圾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垃圾围城现象屡见不鲜,即便远在人迹罕至的南北两极亦未能幸免。据报道,全球每年垃圾产量至少100亿吨,这一数据还在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寻找新的垃圾填埋场越来越困难的局面。

重视垃圾分类与处理,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日本在这方面是国际公认的“优等生”。不过,本书并非是一部替垃圾分类“优等生”歌功颂德之作。作者杉本裕明曾在媒体工作多年,长期致力于环境问题报道。相较于局外人对日本垃圾分类处理成就的纷纷点赞,杉本裕明看到日本在垃圾处理方面仍旧面临着大量棘手难题,如对核废料的处理除了掩埋似乎还找不到类似变废为宝的良策。

杉本裕明调查发现,在日本所有垃圾处理中,再生做得最好的要数聚酯瓶回收,因聚酯瓶“可以回收再生制造成鸡蛋盒、餐盘、纤维制品、塑料布等物品。围绕聚酯瓶这一资源的回收,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夺战”。换言之,这不仅是简单的垃圾处理,更像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成熟市场。

另一个做得较好的领域当属二手商品。“2007年二手商品零售业(二手商品店)数量约有7700家、销售额约为3400亿日元”。杉本裕明在这里所指的二手商品,其实是我们身边的旧货市场。从杉本裕明的调查看,日本二手商品市场自我消化能力其实极其有限,相当一部分选择出口海外,比如菲律宾这样的东南亚国家。

从本质上讲,这是垃圾的出口式转移,与饱为人们诟病的洋垃圾并无根本区别。

焚烧发电是日本垃圾处理绕不开的话题。然而,泡沫经济破灭后,垃圾排放量的减少导致垃圾发电厂面临“断炊”的尴尬局面。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垃圾焚烧发电受技术和工艺制约,燃烧产生的剧毒废气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还有,由于垃圾焚烧发电电价过高,市场化生存极其艰难。

在杉本裕明看来,除了核废料回收利用几无可能外,食品废弃物的处理至目前亦未找到科学的路径。按照日本的《食品回收法》规定,厨余垃圾优先是饲料化,其次是肥料化。当二者都难以实现时,可以利用发酵技术实现沼气化处理,以及煤炭化热循环。如果75公里以内没有设施的话,可以用于焚烧发电。不难看出,厨余垃圾走焚烧发电这条路既不科学也不经济,如何为厨余垃圾处理寻找市场化的科学道路,这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杉本裕明并未将视角局限日本本土,他试图从同是垃圾处理“优等生”的德国寻找更多答案。虽然他觉得德国在垃圾处理

方面做得不一定比日本好,但德国力推的“扩大生产者责任”(即“要求生产者承担包装容器垃圾的回收与再生责任,从而实现了较高的回收率和机器分拣率”)可资借鉴。杉本裕明相信,让生产者承担回收与再生责任,虽然此举存在一些逻辑瑕疵,但肯定更有助于从源头构建市场驱动的垃圾处理机制。

前面提到日本的垃圾再生利用率很高,但“排名第一的是千叶市,再生利用率为32.3%”,也就是说即便是千叶市,亦有大约七成的垃圾无法得到再生利用。“优等生”尚且如此,其他就不用说。如此说来,相较于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物质满足,人类在垃圾处理方面倾注的热心远远不够,投入的精力亦微不足道。尽管媒体频频发出严厉的警告,但相较于市场铆足劲研发新商品的势头,垃圾回收处理特别是循环利用进展依然十分有限。

透过杉本裕明对垃圾分类处理“优等生”的调查不难发现,垃圾处理不仅需要巨量资金,还需要持之以恒寻找新的科学路径。其实还有另外很大一部分本书并未深入揭露,那就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洋垃圾的重要输出国,只不过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

讲小说,也是讲生活



《小说六讲》,讲的不只是小说,也是生活。

这六堂小说课体贴入微,富有亲和力。没有高头华章,没有艰深理论,没有概念术语,王安忆结合自己的生活、文学生涯,款款而谈。

翻开书的初始,我愣了愣,它不符合我的预期。最初的几篇,写得就像回忆录。王安忆说,1977年,她写下了第一篇获出版社接纳的文章,然而,因为时势弄人,这篇叫做《大理石》的散文在刊印后却不能发行,只能湮埋于故纸堆。接下来的几篇,王安忆写自己进入儿童出版社,写儿童文学,写知青生活,写早期作品的创作过程,写美国留学的启蒙;诚恳,真挚,朴实。就像每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作者走过的履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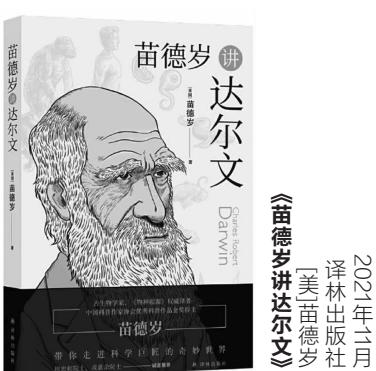
这些讲述之后,王安忆才提出了关于小说的核心理念:生活经验——重要的是内心。为什么写作?很多人可能都问过自己。王安忆的回答是,“我要创造,我渴望创造”。她渴望创造的是她在现实里无法实现的一种生活,无法兑现、仿佛是乌有之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和她的生活有关系。王安忆说,如果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的情感的容量,她不可能产生创造另一种存在的欲望。

对写作者而言,阅读不仅是工作,也是生活。一切都是因兴趣而生,为什么她独对写作有兴趣呢?当王安忆谈起阅读经历的时候,我发现,这并不是埋头书斋的封闭世界,她说母语的魅力,讲起上海弄堂的市井生活,也讲到插队落户时农村里的风俗人情,她把这些观察融入了阅读,与她读过的作品相互呼应,又从中抽离出她对童话、校园小说、爱情小说的基本看法,我觉得,这几种题材都是成长主题的,王安忆实际上就是在讲阅读与成长的关系。

作为一个高知名度的作家,王安忆并不避讳对类型小说的兴趣。知识分子多少有精英意识,期望超出普遍性,获得更高的价值。王安忆说,阅读流行小说满足了她的娱乐享受,但是却不能纳入写作,因为它承担不起她的思想,但是,类型小说的技术处理,比如认识、想象、组织情节、叙事结构等,是非常好且可供借鉴的,也是她在教授小说课程中的心得。

王安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创意写作

你认识有趣的达尔文吗?



《苗德岁讲达尔文》是一部很好的通识读物。作者苗德岁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理学硕士,后赴美学习、工作,1989年至荣休任职于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是首位获得“北美古脊椎动

物学会罗美尔奖”的华裔学者。

苗德岁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达尔文学说,而且有意识地向“科学性、文艺性、趣味性”的“三合一”方向努力。这些年来,他写了很多有关达尔文的报章文稿和书评,这部作品就是这些文章的结集。因为是集子,文章与文章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显得有些松散,不过,这也有优点,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立体、多元形象的达尔文。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最主要成果,也是影响现代科学史世界史的重要文本。阅读达尔文,需要梳理进化论的来龙去脉,了解《物种起源》的成书背景,以及达尔文家族的家学渊源。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也是一名出色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从祖父的《动物命名学》里得到了很多启发,后来又用自己的科学发现纠正了祖父研究里的一些谬误。

苗德岁翻译过《物种起源》,还写了好几篇文章评价《物种起源》的功绩。苗德岁说,《物种起源》推翻了“神创论”,并以自然

选择这一非神力干预的机制解释了生物的演化,揭示生物多样性与万物共祖是生命演进的同一硬币的两面。诚如达尔文本人所言:“生命如是之观,何等壮丽恢宏。”

《小猪大号航海记》是达尔文的另一部佳作。这场改变人生的环球科考,奠定了达尔文的功业。苗德岁在评述陈红译本的书评里,回顾了这部作品出炉的前后经历,而且称赞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书”,还大段摘引了青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呆着陆龟玩儿的记叙片段,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我印象里那个严肃的科学家达尔文原来也有这么调皮的时候啊。

除了以上两部作品,对于达尔文的其他作品,我们大概都不知道。原来,达尔文1844年就写了《物种理论纲要》,他为什么要雪藏十五年?达尔文关于兰花受精的研究,得到植物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和赞赏。达尔文在写了《论英国及外国兰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及杂交的良好效果》之后,还写了《攀缘植物的运动和习性》,还有

亲切自然的《达尔文通信集》,达尔文对植物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腐殖土与蚯蚓》等书,又展现了达尔文多领域的研究。

为了做这些研究,达尔文真是竭尽所能啊。毕竟,当时的科研条件和科研手段那么简陋落后。很多时候,达尔文的科研活动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比如,为了写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从大儿子威廉出生起,达尔文就开始详细记录子女们的行为举止。达尔文有十来个子女,这些孩子真是帮了他的大忙啦,从本书附录的插图里,可以看到孩子们是怎样努力做出各种表情,或仰天大笑或望天兴叹,或黯然神伤或低头饮泣,据说,达尔文家的宠物狗狗、猫咪,还有猴子,也要参与到他的实验里的。不容易啊!

达尔文的图像总是大胡子秃顶的老头儿,而现在,我感觉到了他那颗跳动的、永远好奇的童心。读了这本书,我对达尔文的认识更加全面了,你是也会和我一样更喜欢他呢?

□林颐